



李大钊

研究探微

○ 杨纪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自 序

《李大钊研究探微》，是《李大钊研究论札》一书的继续和深入。

《探微》有它的特色，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初步的，也是微浅的，它反映了在李大钊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与切磋。我并不认为书中的看法都对，只是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请同行批评，请专家指教，以便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气氛中逐步取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把李大钊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殷切希望的。

作 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李大钊论社会主义竞争	(1)
李大钊论无产阶级领导权	(7)
李大钊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定名的	(23)
李大钊指导铁路密查员的斗争	(27)
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40)
李大钊是怎样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努力的	(48)
李大钊论孙中山	(63)
李大钊与马叙伦	(77)
李大钊与陈毅	(93)
李大钊与北方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109)
李大钊的民族观	(118)
李大钊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135)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谈到了“以机器代替人工 生产的事”	(142)
“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	(146)
李大钊与陕西的革命军事活动	(148)
李大钊研究中的新突破	(161)

李大钊与《国际歌》	(167)
李大钊论中日友好关系	(174)
李大钊与中日文化交流	(183)
李大钊在苏联活动的几则新材料	(201)
勃拉戈达托夫对李大钊的评价	(203)
关于《毛泽东》一书中的李大钊	(205)
国内外纪念李大钊逝世 60 周年情况简介	(210)
后 记	(214)

李大钊论社会主义竞争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竞争问题。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把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这就促使他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

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为这门新课编写的讲义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著作。当时，他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情况，以及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误解，明确地指出：“现在社会主义已到实行之地步，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①李大钊不仅提出了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竞争的观点，而且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在性质、范围、目的和手段上的根本不同。在 1920 年下半年的中国，李大钊能够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是极其可贵的。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任何一个新论点的提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理论作基础的。在 1920 年下半年的中国，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竞争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李大钊认为，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他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他认为，在现时代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竞争，就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竞争。既有经济的竞争，又有政治的竞争，还有青年与老人的竞争，等等。他不仅主张人人都有一种竞争、发明、奋进的精神，而且还批评那种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的说法是一种“厌世主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李大钊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一种新的社会，其制度与理想全为新创。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法则，是促进社会改良的制度。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达到改造社会、促进社会改良的目的呢？他说：“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

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②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活的机体，而不应该是死的状态，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始终是活的机体，它就能够永远保持向上的进程，而竞争正是社会主义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

第二，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的，只有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才是实在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③而“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④就社会生产的状况来说，“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⑤这就是说，社

会主义的竞争不仅是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竞争，而且是在保证人民最大幸福的基础上，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良好竞争，而绝不是像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陷入悲惨境地的竞争。所以，李大钊强调说：社会主义的竞争是“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

第三，要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避免资本主义的惨烈竞争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他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中就曾指出：生产品不就是为了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又说：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间流行的货币。李大钊不仅提出了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按照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的来进行。所以，李大钊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政府的，不能齐一努力，是一场惨烈的竞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计划的，能够齐一努力，是一种良好的竞争。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得利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则使人人都能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故认社会主义的竞争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者误矣。

第四，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后亦有相当的竞争

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竞争的论点，首先是针对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而发的，同时，也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的。李大钊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的基础较深，虽然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经济上的变动却不能骤然表现出来，但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后，要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就会有一个相当的竞争。在政治方面，李大钊指出：“中国现在切须注重者，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坚固团体，以为将来实际竞争之着手。”^④这种政治的、经济的竞争，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必需，而且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所需要。我想，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的目的和意义。

在1920年下半年的中国，李大钊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良好的竞争的论点，的确是一个创见。这不仅表明他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不断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而且记录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这些正确而透彻的见解，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大钊对这个重要论点还没能做出系统的阐明，1920年以后也再没有论及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存在着竞争的问题，只能是一个开创性的原则阐述。对于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苛求于先驱者的。

注 释：

- ①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374 页。
-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437 — 438 页。
- ③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142 页。
- ④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376 页。
- ⑤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375 页。
- ⑥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628 页。

李大钊论无产阶级领导权

关于我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问题，1985年，何一成同志在《湖南师大学报》第1期著文认为：如果从最先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来说，它的首倡者应是高君宇；如果从科学阐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概念来说，它的首倡者应是邓中夏；如果从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说，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还是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章还说：在瞿秋白以前，蔡和森、向警予等也都论述过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等等。这里，没有提到李大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十月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大家知道，李大钊是一个十分注视和研究世界新潮流的人。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并且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的文章，高呼世界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早在1917年4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著文，就指出了无产阶级在今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说：在当代，“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若英，若美，若法，政治上、社会上之一切改革，罔不酝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又说：吾国“解决工人问题（农民之疾苦亦包于其中）、妇人问题等，自为今后之急务”。他强调：“工人问题之解决，以工人自己运动之力居多。”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文末又说：“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于是，他热情地表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①

不仅如此，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深刻地指出：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在李大钊看来，这个“新”字集中到一点，就是：“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去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他又一次热情地欢呼：“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

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②

1921年3月和7月，李大钊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和《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两文中，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布党如何在俄国组织劳农政府，把一切政权都掌握在人民委员会的情况。同年12月，李大钊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中对劳农专政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作了阐述。他深刻而又明确地指出：在俄国劳农政府成立以后，制度与理想全为新创。其政治现状尚在无产阶级的专政时期，大权皆集中于中央，而由一种阶级（无产阶级）操纵之。他们为什么须以此种阶级专政为一过渡时期呢？因为俄国许多资本阶级，尚是死灰复燃似的。为保护这新理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提防。

1922年3月12日，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站在时代的高度，极其深刻地写道：“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只要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还要受资产阶级意志统治的这种时代继续存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正是这种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也可以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③

这些论述说明，在黑暗的中国，李大钊是第一个热烈欢呼十月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的人，也是最早地指出了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的人。这正是先驱者的不朽之处。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些表述

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思考，对于李大钊来说，是与他热烈欢呼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同时开始的。

众所周知，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④这样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叫社会主义民主。如果从争得民主这个意义上来说，1918年12月，李大钊在《〈国体与青年〉跋》中写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写道：为了适应世界革命的新潮流，我们必须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民主作世界的民主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民主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中的一个进程”。所以，“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我们民主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惟一的要求，乃在把我们中国的民主维持得住，使他有个向上进步的基础，不为世界民主的障碍就是了。”^⑤这些话，在当时的中国，说得很有分寸，也讲得很有策略。

1919年1月26日，李大钊在《平民独裁政治》一文中指出：“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⑥同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著名论文中进一步指出：自马氏与恩格斯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

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又说：“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我们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⑦

1920年，李大钊在《桑西门的历史观》一文中，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前途。他说：“产业者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的。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⑧同年下半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讲演中进一步指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⑨

这些论述说明，李大钊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仅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为李大钊提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到了1921年3月，李大钊就明确地提出中国要想实行社会主义，必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组织的政府。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两文中。李大钊在前文中驳斥所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的谬论时，列举了俄罗斯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后振兴实业的事实。接着指出：中国“现在若果实行平民专政，先将这样资本强行搜集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因为，“中国实业界的人，没有不受官僚的操纵压迫的。既行社会主义而后，则此种掣肘实业的人，当然可以消

灭了。”所以，“我要说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⑩李大钊在后文中还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⑪这就较早地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二大以后，李大钊根据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如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农政府进行了新的探索。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篇讲演中，驳斥所谓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的言论时指出：“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⑫6月1日，李大钊等在《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中又指出：“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又说，“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在此之后，即9月3日，李大钊在《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说词》中讲：“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而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

我们手里不止。”11月7日，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进一步地写道：在纪念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我们中国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⑬同年12月17日，李大钊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又写道：我们要想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和劳工问题，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到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还说：女高师学生到日本参观的时候，日本社会主义者，力劝伊们不要轻视政权。盖因有政权，改革社会才有力量。因此，现在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就是：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⑭

1923年，李大钊着重论述了如何在中国组织一个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机构问题。1月16日，他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作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的讲演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首先经过政权的夺取这个阶段。要夺取政权，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这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为此，他特意引证了马克思教导的一句名言：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⑮6月中旬，李大钊在党的三大会上讨论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发言中，强调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⑯7月22日，李大钊在《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一文中，提出了“当前必须着手组织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问题。